

略論中共的烏托邦思想——

對金觀濤論旨的幾點回應

●張 灝

中共的興起與烏托邦

金觀濤的〈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第二期）把中共思想中的烏托邦主義提出來討論，此時此地，非常有意義。共產黨從1917年到現在已經七十多年了，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一場烏托邦主義最大實驗的失敗。現在西方學者已經有人開始對這場實驗的失敗進行反省，這種反省對於中共思想、中共政權來講，意義尤為深切，因為這就像金觀濤所講的，中共的興起與烏托邦主義有着密切的關係。

以往海外學者對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有種種的解釋，但都沒有強調烏托邦這一因素（當然在它後面還有個理想主義的問題）。海外最有影響的一種解釋是西方學者提出來的，他們認為中共的興起，中國的知識分子為甚麼在20年代和30年代普遍接受共產主義，這同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甚麼關係，而主要是受到列寧主義中反

帝思想的影響，反帝使得共產主義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乃至廣大的中國人民產生了一個強大的吸引力。這種觀點雖然不能說是全錯，但是過於簡單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普遍為人接受，反帝思想與其連帶的民族主義不無關係；但是，共產黨的歷史觀，特別是歷史的盡頭有一個美好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是天堂」，這個觀念也是很重要的。

從文獻來看，只要翻翻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全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在五卅期間接受共產主義，這跟他們的烏托邦心態，跟他們那種強烈的理想主義，是有密切關係的。同時，中共建國以後，這種烏托邦影響仍然很大，甚至有段時間越來越大。我們若用比較的眼光來看，這是很特殊的，因為在其他共產主義地區、共產主義國家，當政權建立以後，西方政治學者注意到一種反激化（deradicalization）現象，即烏托邦思想逐步減退；唯有中國非但未減退，反而激化趨勢繼續增進，在50

年代後期到70年代中期，烏托邦主義變成左右國家、黨的路線的思想，最終使全國捲入烏托邦的狂潮，造成亙古未有的悲劇，其悲劇之深度與廣度，恐怕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第二個例子的。

因此，不論是從中國歷史還是人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都應該對中共的烏托邦思想作深刻的反思。但不可解釋的，也是十分惋惜的，就是海內外學者、知識分子迄今對這個課題的反思似乎很少，至少說還不夠重視。舉例來說，蘇曉康的《河殤》引起多麼廣泛的影響，可是他的另一本著作《烏托邦祭》，反應卻很寥落，遠不能與《河殤》相比。因此從這個觀點上來講，金觀濤將烏托邦問題拿出來加以檢討、加以反省，意義非常重大。

小傳統及西潮

金觀濤對共產主義、烏托邦思想起源背景的解釋，發揮了他近幾年來的主要論旨，即馬克思思想儒家化。這篇文章就是這一論旨的一個擴大，一個延伸。因此他也特別強調儒家的背景。

我想就他的這一論旨提出幾點簡單的意見。

我同意儒家思想的背景是很重要的，但金文似乎過分強調其重要性，也許這是因為篇幅的關係，因此我想在此作兩點補充。

第一點，考慮中共烏托邦思想的背景時，對中國文化的小傳統需要加以注意。中國民間信仰含有許多想入非非的東西，其中就包含有烏托邦思想的成分，特別是民間的道家思想、佛教思想，這也是為甚麼歷代農民起

義都帶有來自民間文化的烏托邦色彩，從東漢黃巾到晚清的洪秀全，莫不如此。毛澤東來自民間，他對這個傳承是很熟悉的。據他自己講，他的母親就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相信他接觸到民間流傳的佛經、寶卷這一類東西；同時他對民間的神奇小說、演義等，也涉獵很廣。因此要談他的烏托邦思想，我認為這個小傳統是需要考慮的。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西方近代思潮。毛澤東的成長年代（他是1893年出生的）正是我所說的「近代轉型時期」——從1895到1925年這三十年左右的時期，也就是從戊戌維新到五四運動前後的這段時期。這段時期「西學東漸」，西方思想、西方文化大量輸入，這些西方近代的思潮常常含有強烈的烏托邦傾向，如進化史觀，將歷史說成是一個演進的過程，過程的盡頭是一個美好的社會，這是西方近代思想中很普遍的一個觀念。西方近代思想中還含有一種人力無邊、人定勝天的踐世精神，相信人的能力可以建天堂於地上，這種趨勢也是很容易產生烏托邦思想的。烏托邦思想瀰漫了整個西方近代思潮，不論是理性主義還是浪漫主義，都含有烏托邦思想的傾向。這些思想在「轉型時期」透過嚴復、梁啟超以及五四時期的思潮，得以在中國普遍散佈，而毛澤東正成長於這一時期，因此他是很容易接受這方面思想影響的。

金觀濤雖然也提到這一點，如進化史觀，但從他的論旨看來，西方的影響是消極的。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含有烏托邦思想傾向，可是他又將這種傾向說成是隱性的，用我的話來講，就是被「架空」。他認為儒家傳統思想中有三個因素使烏托邦傾

向被架空（參閱金文），而傳入的西方思想把這三個被架空的因素取消掉了。用一個譬喻來說明，傳統裏的烏托邦思想好像是一隻小鳥關在籠子裏，西方影響的功能就是把籠子打開，小鳥飛出來了。我認爲西方的影響恐怕還不止這一點，它不但把籠子打開，讓小鳥飛出來，而且還改變了小鳥的形狀。再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儒家的烏托邦思想有好幾種，但不論是哪一種，儒家所憧憬的烏托邦是家庭的擴大，而不是家庭的超越。而近代烏托邦思想裏面，從康有爲到毛澤東，他們都是主張去掉家庭的。就這點而言，佛教不無影響，但我相信西方的思想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傳統烏托邦思想的歷史作用

關於金觀濤對儒家思想中的烏托邦精神所作的解釋，我是大致同意的，但有所保留。首先，我同意儒家思想是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的，譬如《大學》所追求的不僅是至善的個人，而且是一個至善的社會，這也就是爲何宋明儒者動輒提「三代」，而且希望回到三代。但重要的是，金觀濤認爲烏托邦思想雖然存在於儒家傳統裏面，但其地位常常是被架空，其作用常常被抑制。關於這個看法，我是有些保留，我認爲一部分被抑制了，一部分沒有被抑制；一部分被架空，一部分沒有被架空。我想就他所講的三個因素略作說明。

第一，金觀濤認爲烏托邦思想停留在一個隱性的狀態，是因爲儒家把烏托邦思想擺在過去，但這也未必盡然。再以宋明儒學作例子，宋明儒家常常說三代，比方說，朱夫子把過去

的歷史分爲兩段，一段是所謂天道流行的「三代」，另外就是一團漆黑的「三代」以後，但他們想到三代時，不僅緬懷遠古，也憧憬未來，希望「三代可復」。「三代可復」蘊含着一些前瞻意識，也就是說未來有烏托邦再實現的這個可能。

其次，他認爲儒家的個人修身和道德菁英思想，是抑制烏托邦思想的一個重要因素，這點很可商榷。儒家的修身，是儒家對人性的樂觀表現，是儒家烏托邦思想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人皆可以爲堯舜」，因此儒家時而有羣龍無首的遐想，更重要的是他們相信即使大多數人不能修身成德，但少數人還是可以的。少數人一旦修身成德，他們就可以通過他們的影響，「君子德風，小人德草」，這種影響造成善良風俗，可以發展到一個理想的秩序，這就是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就是一個烏托邦，至少用金觀濤的話講是一個「準烏托邦」，那麼這種影響就不僅僅是隱性的，它對於傳統的現實政治和社會，都有明顯影響。

因此以上二因素都不能算有抑制儒家烏托邦思想的作用，真正有抑制作用的是金觀濤文中提到的另一因素，也就是儒家傳統中把倫常思想與烏托邦思想加以綜合與等同的趨勢。現在就此趨勢，稍作說明。

我們知道，傳統儒家的義理結構是一套宇宙觀與一套價值觀的結合，此結合體從原始儒家開始就有兩個面度（所謂雙面性）。一方面是繼承殷商以來的一種宇宙神話（cosmological myth），這種神話有兩個成分：一、相信皇權制度與家族制度是緊結在一起的，可稱之爲君父一體思想；二、相信這兩種制度都是植基於宇宙秩序，因此是代表「天之經地之義」，是

不可變的。這種神話，發源於殷商，透過周朝的禮制，而為原始儒家所承襲，發展到漢儒便成以「三綱」為代表的綱常名教思想。

另一方面是原始儒家的思想創新的一面，這種思想有三個段落：一、相信超越的天（或天道）可以內在於人世或人性；二、因此造成本質與現實之分別；三、本質不但代表超越，而且也代表遠古的黃金時代。這三段論的思想結構是蘊涵着烏托邦的傾向，但是上面提到從原始儒家開始，這個三段結構就和宇宙神話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其結果是：皇權意識與家族意識滲透入超越的天道意識，造成超越意識之被架空與腰斬。因此三段結構中所蘊涵的烏托邦意識與綱常名教思想由銜結而等同，更進而被化解、被取消。

綜上所論，儒家烏托邦思想是有被綱常名教意識所架空的趨勢，但同時不可忽略的是：由個人修身成德思想所衍生的聖王觀念，在儒家傳統裏

也代表一種烏托邦傾向，對近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包括共產政治文化是有很深刻的影響。

總之，要瞭解中共的烏托邦思想之來源及性質，我們必須多方探討，正視其複雜性。就此而言，金觀濤這篇文章似過分強調儒家的影響，同時也簡化儒家思想內部的複雜性。但他提出的近代烏托邦思想與儒家傳統的問題，以及隱藏在背後有關理想主義與中國近代政治悲劇之間的關係問題，則是很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反覆討論的。

張 灝 1937年生，安徽滁縣人，畢業於台灣大學、哈佛大學。曾著有《中國近代知識份子與危機意識》、《批判意識與烈士精神：譚嗣同思想研究》、《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中英文等書。現任教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

